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财政理论的探索

史 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财政理论研究,不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成立专门机构,组织财政理论研究,而且不少党的领导人亲自进行了财政理论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财政理论体系,不仅为各个时期党提出财政政策,进行财政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新中国财政工作做好了理论与人才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财政理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 财政理论探索

**中图分类号:**F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08-0023-05

## 一、马克思财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要成立研究机构,研究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问题<sup>[1]</sup>。实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各地共产党小组就十分重视马克思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研究工作。如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该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就是李大钊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专题报告<sup>[2]</sup>。当时的会员中就有北京大学财政学教授陈启修,他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资本论》译者,还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型财政学教科书,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财政学》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谭平山等

很多早期共产党人都对财政问题有一定研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基于反帝反封建目标的财政思想。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在后来被称为“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sup>[3]</sup>。这份宣言向全国人民指出军阀不打倒,想让他们不强索军费不扰乱中央及地方的财政秩序、不滥借外债做军费政费以增加列强在华势力,不横征暴敛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对当时希望用西方财政理论引进西方财政制度进行财政改良的一个明确回应。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财政主张,要求对外取消列强治外特权,改正协定关税,对内消灭军阀,没收其财产。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征税,通过法律限制租课率,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

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各机关刊物上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和苏联财政实践情况外,还

[收稿日期]2021-08-02

[作者简介]史卫,教科文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财政史、财政政策。

参与创办了《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学艺》《太平洋》《政衡》等刊物组织财经问题研究。其中,包括了财政历史、现状及国外财税学说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曾刊登《近代租税之趋势与中国租税》《现代租税问题》等;《学艺》曾刊登《亚当斯密之租税四大原则》等;《太平洋》曾刊登《中国租税史略》等。

这一时期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走进工厂、深入农村,领导工农运动,不仅组织了抗租抗税运动,还领导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在运动中,也对中国各地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恽代英的《中国财政状况述评》等。这些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报告,里面都包含了财政问题,不仅让大家对中国实际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也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的中国化。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国共合作之后,很快形成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一些财政主张也体现在了国民党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

## 二、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在根据地实践中初步形成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血腥屠杀,不改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坚定站起来继续奋斗。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目标。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提出要废除军阀政府的一切赋税制度,建立革命政权重定单一的统一税制,而且税收的一部分要用作公费,实施改良水利扩大灌溉源流等工程。废除租田押田制度,由农民

代表会议(苏维埃)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sup>[3]</sup>。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前的财政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指出帝国主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集中中国经济生活的管理权。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可以排斥国货。军阀的课税制度,实际是军事封建式的赋役。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国家要帮助经济发展<sup>[3]</sup>。

党的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思想直接体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等法律上,并得到了深入的实践。1932年8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要求财政部在必要时可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研究各种专门问题,并可聘请专门人才为委员<sup>[4]</sup>。

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对根据地的财政实践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苏区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苏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采取统一的累进税制,苏区财政支出坚持节省原则,苏区财政政策要极力改良人民的生活,帮助人们发展生产。这一论述通过苏区的财政实践,将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建构了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经济学者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经济情报社等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财经问题研究,并以《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为窗口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财经思想、探讨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批判国统区的财经政策<sup>[5]</sup>。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财经学说与中国实际

紧密结合,也为党培养了大量财经科研人才。骆耕漠、徐雪寒、薛暮桥、朱楚辛、张锡昌等后来都发展成为党在财经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和研究专家。如朱楚辛曾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一批同信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学者相区别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财经学者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的发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财政理论探索和建设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多次号召党的干部要学习经济,重视经济工作。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在党政军高级部门设置调查研究机关的要求<sup>[6]</sup>。从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到各根据地党政部门都设立了研究机构,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财经问题是各研究机构研究的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1942年12月通过《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出政策研究室要研究农业建设问题、农业累进税问题、减租减息问题等<sup>[7]</sup>。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也设有研究室,陈如龙曾担任研究室主任。陈如龙在解放后担任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机构的成立,对推动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毛泽东就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调研工作,他通过座谈会和书信方式,与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南汉宸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在写给谢觉哉的信中强调要深入探索财政问题的“规律性或决定点”<sup>[8]</sup>,在给南汉宸的信中提出要使广大干部看了能“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做法”<sup>[8]</sup>。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毛泽东在1942年12月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参会同志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毛泽东在报告最后指出,原计划还要专门讲税收和节约的问题,但是由于高干会闭幕,没有时间写了,只好暂付阙如,也给我们留下永远的遗憾。

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将中国共产党前一阶段的财政工作做了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最系统的一次理论阐述。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的原理,强调要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去解决财政问题。在财政收入方面,毛泽东强调要兼顾人民的困难,控制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并通过发展公营经济和大生产运动,加大自给能力,求之于己,从而减轻人民负担,以休养民力。在支出方面,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通过精兵简政,一举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重视人民的利益,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财政思想。毛泽东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指出财政工作第一位是“予”,第二位才是“取”。他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sup>[9]</sup>。毛泽东指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与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sup>[10]</sup>

1944年3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这是陈云以主要精力从事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始<sup>[11]</sup>。陈云第一次提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财政思想。他指出力量要集中,不要分散,集中才能救急,要考虑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他还提出了财政工作的方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sup>[12]</sup>。这一时期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等不少领导人都对财经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党的财政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财政理论建设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提出“并不没收其他

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到:“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他强调“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sup>[13]</sup>。这些思想对解放前后财政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

#### 四、为新中国财政工作做理论与人才的准备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在给全会做政治报告时就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不同财政思想指导下的财政工作进行了对比。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为什么却造成大部分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各阶层的人民生活痛苦达于极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为什么却能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很好解决了粮食问题,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通过与国民党政策的对比,总结了边区治理经验,回应了人民要求建立救济基金、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减租减息、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扶助民间工业、改善工人生活、发展大众文化教育等呼声,描绘

了发展工业,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的目标。提出要让公私共同发展,调节劳资关系等主张。

1945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期间,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也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协调劳资之原则,改善劳工生活”“改善国民生计”等构想,但却没有切实的办法去实行,重点放在布置战后的内战,提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共产党,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sup>[14]</sup>

在不同的财政思想指导下,国统区和根据地社会经济发展在抗战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国民党政府把接收办成了“劫收”,一些接收大员成为“劫收专员”,不仅大量贪污接收物资,还肆无忌惮地以没收逆产为名掠夺民财,甚至为了劫掠而相互争斗。当时有所谓“五子登科”之说,“五子”即房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到:“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sup>①</sup>国民政府通过接收抢夺了大批胜利果实,却带来了社会生产急剧萎缩、社会矛盾快速激化,财政收入锐减的恶果,严重动摇了其统治基础。而此时的解放区,由于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美国记者走访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张家口市,不仅旧的商号纷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张,商行达2700多家,比战前增加了30多家。美国记者宝丁在访问张家口后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后,虽只两个月,而社会秩序已很安定,……许多工厂都很快地复工了,真引起我的钦佩”。美国记者博乐在根据地进行了五个月的采访,观察到“私人生产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励”,“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所欢迎”,“除对敌伪的产业外,并无没收任何财产的企图”。博乐写道“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也很热心。我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商谈天,发觉

<sup>①</sup>《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6日,6月8日,转引自杨天石《反贪:蒋介石的严刑与空言》,《同舟共进》2013(12)。

他们热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造商以利益”<sup>[15]</sup>。解放区的人民欢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也使国共两党的实力对比、民心向背很快发生了逆转。

1947年春,在即将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时候,中共中央开始部署统一解放区财经工作。1947年3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华东、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各大解放区的代表齐聚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河北省邯郸市,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统一管理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史称“华北财经会议”。为了充分研究问题和统一思想,会议开了近三个月,最终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华北财经会议决议》提出成立统一的财经管理机构,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逐渐实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统一。1948年5月,又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两次财经会议的召开,为解放区统一财经工作统一了思想,做好了理论和政策的准备,指明了财经工作的发展方向,意义重大。华北财经会议之后不久,中央就开始着手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其后根据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华北财经办事处又一分为二,一部分组建了中央财政经济部,一部分另组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中央又以原中央财政部和华北财委为基础组建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这些机构除了负责领导全国财经统一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当时的财经问题进行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室的负责人王学文、黄松龄都是当时有名的财经学者。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创建了华北财经学院,加快了财经干部培养。

解放战争后期,党的财政工作的重心已经开始由过去从农村为主开始转向以城市为主,由保障革命战争转向经济恢复和建设。党中央为了适应这种转变的需要,也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和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提出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已经是

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指出“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sup>[16]</sup>。为了更好阐述和落实这些思想,许多党的领导人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可以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机构和干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即将展开的新中国财政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财政理论探索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财政理论探索中逐步构建了与西方财政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完全不同的财政理论框架。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工农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断探索的结晶,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为根据地财经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伊始就十分重视财政理论探索,党的早期领导人很多都对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也使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期总能提出正确的财政政策,并不断就财政实践中的正确做法进行理论提升,进行经验的推广,而且对财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切实的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也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财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财政理论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了已经比较成熟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的理论框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使得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基础理论建设中有了突破苏联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底气和基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广泛借鉴域外财政理论的成功

(下转第46页)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3.
- [2]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人民出版社,1993.
-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
-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4.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1931、1949)[M].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上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11] 刘佐.中国税制五十年(1949-1999)[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 [12] 梁尚敏,陈光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简史[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
- [13] 冯田夫,李伟光.中国财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 [14]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法律出版社,2011.
- [15] 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M].中华

书局,2019.

- [16] 陈志让.军绅政权[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17] 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 [18]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1986.
- [19] 李诚.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内在逻辑及路径启示——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6):97-104.
- [20] 刘佐.中共税收政策的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作[J].经济研究参考,2011(55):70-87.
- [21] 邓力平.中国特色“人民税收”理念新论[J].东南学术,2020(04):126-135+247.
- [22] 顾小璐,陈晓东.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J].中州学刊,2020(11):65-69.
- [23] 吕冰洋,张兆强.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从嵌入经济到嵌入社会[J].社会学研究,2020(4):152-173.
- [24] 宁洁,韩桥生.以人民为中心: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6):186-194.
- [25] 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17(4):33-46.
- [26] 武靖国.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国家治理意蕴[J].税收研究资料,2019(4):21-25.

【责任编辑 寇明凤】

(上接第27页)

果,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构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财政理论的经验、勇气和自信也为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P3.
- [2]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J].新文学史料,1979(3).
-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P501-502,P299-353.
- [4] 柯华.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P57-58.
- [5] 吴敏超.《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与左翼经济学家[J].近代史研究,2009(4).

-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P174.
- [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P606.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P176,P209.
- [9]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467.
-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P895.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P353.
- [12] 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288-289.
-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1429.
- [14] 程思远.政坛回忆录[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P158.
- [15]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N].新华日报,1946-6-14.
-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429.

【责任编辑 成丹】